

WORK AND WELFARE 工作与福利

(美) 罗伯特·索洛 格特路德·希梅尔法尔
安东尼·刘易斯 格伦·劳里 约翰·罗默 著
刘文忻 陆云航 黄雪蒙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ORK
AND WELFARE
工作与福利

〔美〕罗伯特·索洛 格特路德·希梅尔法尔
安东尼·刘易斯 格伦·劳里 约翰·罗默 著
刘文忻 陆云航 黄雪蒙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07—46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作与福利/[美] 索洛等著; 陆云航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5004-8374-8

I. ①工… II. ①索…②陆… III. ①劳动—研究
②社会福利—研究 IV. ①F014. 2②C913.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694 号

Copyright © 199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享有本书中国大陆地区简体中文版专有权。

责任编辑 张 红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插 页 2

字 数 85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一

在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保障）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选择性社会福利（保障）模式，另一类是普遍性社会（保障）福利模式。选择性社会福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家境调查或群体甄别，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如穷人、老人、患病、残疾、单亲父母和孤儿等挑选出来，并向这些真正需要福利救助的特殊群体发放福利。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遍性社会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保障全面和福利均等，即向所有社会成员，不论年龄大小、收入高低，提供同等水平的社会福利。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是采用选择性社会福利模式的典型。瑞典

是采用普遍性社会福利模式的典型。选择性社会福利模式偏重社会救济，而普遍性社会福利模式倚靠社会保险。相对而言，采用选择性社会福利模式的国家，福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较小。然而，即便如此，美国在 1996 年还是发起了一场福利改革，旨在削减社会福利水平，鼓励和支持人们努力脱离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走向自食其力之路。

1996 年的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增加工作要求。克林顿政府把单纯救济和普遍福利改为工作福利制（workfare）和有限救助，促使人们从“吃福利”变成“去工作”。如政府要求接受援助的单亲父母两年内每周工作至少 20 小时，2000 年增加到每周 30 小时，核心家庭更是要求每周工作至少 35 小时。二是限制受益时间。比如，此前对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资助时间是直到子女成年（18 岁），而在新的计划中，单亲父母在子女未成年前要提供累积 60 个月的抚养时间。三是实施制裁措施。联邦政府规定，孩子年龄超过 5 岁的家长如果拒绝由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工作，将会失去福利收益。联邦政府还要求各州必须有一半的福利接受者每周工作 30 小时，

如果各州不能使福利接受者参加工作的比例达到某一设定值，它们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四是消除劳动力进入市场的障碍。美国各州为福利接受者做技能评估，许多州还协助个人制订发展计划。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独立大道”计划（GAIN）通过各种案例分析，为福利接受者提供从找工作、基础教育到技能培训的一系列救助，其他州也实施了类似的计划。

美国福利制度改革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1996—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由人类价值研究中心赞助的人类价值特纳讲座（Tanner Lectures in Human Values）上，作为主讲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对1996年由国会通过并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福利改革法案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讲座的评议人有四位，两位经济学家格伦·劳里（Glenn C. Loury）和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一位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 Lewis）和一位社会学家格特路德·希梅尔法尔（Gertrude Himmelfarb）。本书即是该次讲座的一个完整记录。

福利换工作是一个适时的、重要的主题。本书

涉及的讲座只估计由 1996 年福利改革法案最先发起的“工作要求”的效力。尽管索洛的讲座是在“工作要求”颁行后不久就做出的，但是他预见到了新制度将会带来的许多争论与问题。在本书中，索洛并不讨论任何一个专门计划的细节，而是一般性地阐述他确信一项成功的福利改革所需要的基本支撑。按照索洛的观点，当前福利问题的答案位于两大社会规范即自食其力和利他主义（altruism）的交叉点上。他提供的调查证据表明，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尊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其为家庭提供帮助的能力，福利接受者往往会对自己的处境深感羞愧，他们更愿意去工作而不是吃福利。有意思的是，这一观点与标准的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并不一致。标准模型假定，除了得自工作的收入，个人在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效用。在索洛的模型里，工作还可以通过自食其力的感觉来提供效用。索洛进一步指出，尽管人们通常都有利他之心，但是利他主义的供给是有限的。他提出，帮助妇女摆脱福利、从事工作，将会积攒一个社会的利他主义。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工作，专门依靠政府救济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需要的政府税收也会随之减少。此外，如果福

利接受者为了获得福利收益而不得不去工作，那么纳税人也不会有受损的感觉。索洛相信，实现由挣得的工资对非挣得的福利收益的替代，是可以同时促进自食其力和利他主义的唯一答案。当然，他也不是天真地以为这种制度转型会轻易实现。相反，索洛表明，实践中可行且道德上可接受的那种工作福利制度比政策制定者愿意承认的要昂贵得多，不会轻易实现。

索洛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任何一项“工作要求”计划的成功均有赖于投入该计划的资源数量和努力程度。在许多情况下，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得不去创造，这可以通过公共服务部门就业或者通过扩展对私人部门的激励来实现。再者，考虑到照顾孩子需要的开支以及食品券和住房补贴的丧失，非熟练工人所得的工资往往不能满足基本生活。因此，比起依赖福利，参加工作后不少妇女的境况实质上是恶化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索洛建议，各州应该将福利与工作“捆绑”在一起。威斯康星州是成功地将妇女由依赖福利转变为出去工作的一个地区。这一案例证明索洛的观点是正确的。威斯康星州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如

下这个事实，即该州创造了数千个社区服务工作岗位以及为所有有需要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照顾服务，如孩子照顾等。

对于福利改革，索洛有一个理想化的愿景。他预想的是一种公平的工作福利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那些需要收入帮助的人们有义务去工作，同时社会在整体上也有责任去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和照顾服务。索洛对这一主题的讨论是饶有趣味的，他的观点通常都难以反驳。遗憾的是，本书不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许多实际的帮助。《工作与福利》不是一本指南读物，索洛并没有详述将他勾画的政策付诸实施所需的相关制度细节。

四位思想者对索洛的讲座做出了有益的评论。第一位评论者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雷，他指出：首先，将工作机会仅提供给带有孩子的贫困妇女而不是其他低收入者，这一点很难被证明是正当的，因此，索洛提出的公平福利工作计划将比索洛自己想象的更加昂贵。其次，许多生活在旧城区的贫困居民根本不能胜任工作，因此即使提供他们就业机会也不能减轻问题，工作福利制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好的解决办法。

第二位评论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刘易斯讨论了为什么此时此刻会放弃联邦政府对于福利支持的承诺。他的结论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经历的繁荣至少是部分答案。当最早的社会福利体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颁布施行时，大多数成年人要么是自己因大萧条陷入贫困，要么是亲眼看见某些人陷于贫困因而能够对处在贫困中的人们抱有同情心。但是今天，多数成年人根本不知道曾有过那样严重的经济困局，也不知道有谁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中等阶级和上中等阶级在人数上的增长，已经致使更多的人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相信，那些没有在我们这个市场社会中获得成功的人们，只能责怪自己。此外，刘易斯认为，在讨论中仅仅将自力更生和利他主义作为价值选择可能是不合适的。他指出，索洛在讲座中引用了一位妇女所说的话，那位妇女对于能够获得福利收益非常高兴，因为这使她能够呆在家里照顾孩子并看着孩子成长。刘易斯指出，这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极力促进的那种典型的家庭价值观。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罗默在评论中构建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政府向每

一位雇用了低技能工人的雇主提供补助。他校准了该模型使之适用于美国经济，以阐述各种不同的雇主补助计划如何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结果表明，很难使所有低技能工人实现全部就业。实际上，在模型中，如果将雇主补助设定为零，为了得到 75% 的就业率，福利津贴就要大约每年 871 美元。增加对福利接收者的津贴支付，低技能工人的就业率就会相应降低。例如，假定福利津贴增至每年 5700 美元，那么就业率就降低至 60%。这一结果突出强调了美国经济中就业率与福利津贴水平之间存在交替关系。模型中蕴含的结论也意味着，给定雇主补助水平，低技能工人的工资和就业率会同时增长，然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将趋于下降。罗默的结论是，尽管雇主补助计划可能在总体上会好一些，但是由于它并不自动地有利于高技能工人，因而很难得到执行。

第四位评论人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荣誉退休教授希梅尔法尔，她在评论中指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在处理经济学和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能够给予目前的我们的许多启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阻止依赖。为此，穷人可

以被分成两类：先天的（the impotent）与有独立劳动能力的（the able-bodied）。先天的穷人包括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例如老人和病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关心的主要是阻止依赖感在那些有能力去工作但由于某种原因没去工作的人们中间蔓延。与先天的穷人会得到日常的救济不同，有独立劳动能力的穷人被送往贫民习艺所（workhouse）。贫民习艺所内的条件故意被设置得很差，意在让接受救济变得并不那么愉快，变得并不比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有吸引力。维多利亚时代的福利制度是建立在某些穷人比其他穷人更值得去救助这个道德判断之上的。希曼尔法博注意到，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在美国建立一个远离道德判断的福利制度，这导致了福利人口的去道德化，也就是说，这一制度不仅降低了福利人口的士气，也削弱了他们的道德意志。希梅尔法尔认为，那些执行中的政策，比如严格的工作要求、时间限制以及对非婚生孩子的额外福利津贴的否定，就是给整个社会上了一堂重要的道德课。

《工作与福利》是一本有趣的、易读的书。讲座是为非经济学家听众准备的，评论的水平也与关

心福利改革这个主题的任何人都能适应。对福利的哲学基础、公共政策或者劳动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可以读一读这本书。

陆云航

2009 年 4 月



序 言 二

埃米·古特曼

像选举权一样，有薪水的工作自殖民时代以来就在美国被作为是“公众声望的主要来源”^①。但是与最终被扩展到非洲裔美国人及广大妇女的选举权不同，有薪水的工作并不普遍被认为是每一位有工作能力的美国公民的一项有效权利。有些人认为，每一位有工作能力的美国公民，只要愿意努力工作并按规则行事，就肯定能够赢得公众的尊敬，

① 参见朱迪丝·施克莱（Judith N. Shklar）《美国公民权：追求加入》（*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并且获得一份足以养家的薪水，但是对美国经济的权威分析发现，有些事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美国经济并不能够确保给每一位愿意工作的人提供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何况像养育孩子这样的重要工作——其所需要的付出是无止境的——大多并没有薪水，也不是像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那样是赢得公众尊敬的一个来源。

在美国，主要的联邦福利项目——对子女未成年家庭的资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 AFDC）——是围绕着向符合各种资格要求的穷人们提供现金资助的组织。在这个国家里，AFDC 项目被普遍与“福利”联系在一起，[Ⅷ] 它从未试图去确保给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因此，美国福利制度的目标，从来都不是为所有具备工作能力、愿意参加工作但还没有找到有薪水（并且所获薪水足以供养孩子）的工作的公民赢得公众尊敬创造条件。提供福利资助已经成为对提供工作的一种替代选择，但这两种选择各自所隐含的价值观存在重大差异。经济学家指出了工作和福利之间的重要替代关系。本书将探讨关于美国民主的一些最具意义的问题及其前景，即

这个社会如何评价提供工作与提供福利这两者之间的相互替代。

在 1996—1997 年普林斯顿大学开设的由人类价值研究中心赞助的以人类价值为主题的特纳讲座 (Tanner Lectures in Human Values) 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在他提交的一份强有力但又精巧的案例中指出, 通过创造工作机会使得每一位有工作能力的公民都能够得到有薪水的工作, 可以促使福利向工作转变。另外四位卓越的思想者——格特路德·希梅尔法尔、安东尼·刘易斯、格伦·劳里和约翰·罗默——对索洛所构建的关于福利改革的经济学模型进行了评论。这一模型受两个明确的目标指引: 一是为了增强那些目前依赖福利的公民的自食其力, 二是为了减少对那些向福利做出支付的公民的利他主义需求。由于自食其力在美国文化里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价值观, 因此如果有更多公民将他们自己看做或被他人看做自食其力的人, 则一切就会更好。由于利他主义的提供总是如此有限, 因此在公共政策中将它保留得越多越好——假如没有人会遭排斥。[IX] 根据部分美国纳税人在支持依赖福利的公民上所表现出的明显增

强的不情愿态度，利他主义的保留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尽管索洛对福利改革的探讨，是从增强更为贫穷公民的自食其力以及减少对更为富裕公民的利他主义需求这样的目标开始的，但在讨论的结尾，他提出的建议是，一场有正当辩护理由的福利改革，必须考虑除了增强自食其力和保留利他主义意识以外的其他价值观。例如，索洛反对那种以剥夺父母对他们孩子的监护人资格，或者剥夺成年人在没能找到（或保住）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之际所能抓住的某个安全网为代价，来增强自食其力。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自食其力，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是索洛所明确反对的。

在由福利制向工作福利制这一公平模式的转型中，如何体现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呢？那些依赖政府每月提供的支票而生活的公民，显然不是自食其力的。但是，我们中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福利救济的人，同样也不是自食其力的。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我们都依赖政府并彼此相互依赖。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那些在公平的工作福利制度下找到了工作的公民是变得更为自食其力了呢？有些公民以前依